

■ “世界精神卫生日” 特别报道

一声“爸爸”太沉重

——挪威老外和“中国养女”8 年的故事



老应对明明的教育从不放松，一直“盯得很紧”。 本报记者 郭一江摄

本报记者 张懿 单颖文

当许多人相信“没房子，就难有家”的时候，有人对家的定义给予了新的阐释。

宋铖说，老应是他 10 年中介生涯中最“匪夷所思”的客户。他记得那天上午，这个在上海生活了 8 年、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挪威人，到他店里，希望把徐家汇某高档小区的房子卖掉，而且要求“当天成交”。老应说，着急卖房，是为了筹钱给女儿看病。当天下午，这套房子一下子涌入二十多批看房人。

宋铖说，为了当天就把房子卖了，老应的挂牌价差不多打了八折。要不是早就认识老应，他一定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。

到晚上，在所有客户中，老应选择了一对杭州夫妇，签了合同。宋铖说，成交价比市场价低大约 100 万元。就这样，50 多岁的老应失去了他在中国唯一的房子。但他来不及可惜。因为房子并不是家，而家对他来说，有别样的意义。

在距离江苏交界不到 2 公里的上海远郊，他租下一套房。然后带着卖房拿到的首付款，以及女儿每天都不能离开的药，踏上了北上陕西渭南的火车。

他的女儿，确切地说是非正式养女——明明，就在渭南的一个村庄里。

和一般人想象的老外不同，老应疾病缠身，靠挪威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生活，没有任何积蓄。而每个月，女儿光吃药就要花掉他大约 6000 元。

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陈海莹是明明首次住院时的主治医生。她告诉记者，最初见到个单身老外带着一个中国小姑娘，“先入为主地不信任”。但如今，面对记者，陈海莹说，自己是真心佩服老应。

陈海莹的同事、明明二次入院时的主治医师乔颖，则用了两个字，描述她对这位优雅、温和、异常执着的老外的感受：崇敬。

两位医生以及其他人所见证的，是一个充满曲折的故事：一个初中肄业在上海打工的农村小女孩，意外遇到了同样漂泊在异国他乡的老应，命运从此发生了奇幻般的转折。但女孩考上大学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疾病让她被迫休学，进而又引发了她背后两个家庭的纷争。

上海市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陆荣根说，明明的亲生父亲如今希望她回陕西老家去康复，但“干爸”则希望她留在上海，继续治疗。陆荣根是专门到医院来调停两个家庭的矛盾的。他说，两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女孩好，但文化差异实在太太。

老应说，他做的事不值得报道，但他希望借媒体呼吁，希望社会更重视精神病人的康复，比如，完善监护人制度，同时让家境困难的病人得到有效治疗。

这是一个始于 8 年前、一波三折的故事。它算不上喜剧，也不该被看作悲剧。

琴声,让人忘记了辛酸

记者随老应走进他租来的房子时，是上午十点。刚进门，他朗声说：“明明，该起床了，记者来了。”

他小声给记者解释说，比起从前，明明现在懒洋洋的，这是疾病和电疗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这是一套两室一厅，老应一间，明明一间。

明明走出房间，有些害羞地笑了笑。虽然之前已经见过记者好几次，但隔了几个星期，她却想不起记者是谁。对于很多往事，她只能微笑着摇头，“记不清了”。

记忆力下降，是治疗的副作用之一。乔颖告诉记者，这大概还会持续半年。但从临床上判断，明明康复得很好，神智、情绪都正常，只是需要每天服药。

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，坚持按医嘱长期服药，对预后极其关键。乔颖说，精神科重症初次发病，要连续服药 2 年，如果复发，就要服药 5 年。如果有第三次，就终身离不开药了，而且可能再也无法康复。

几个月前，明明刚刚复发过一次，所以，老应决不想再有第三次。复发的原因是在明明回陕西老家的时候，父母断了她的药。

明明的大哥告诉记者，父母反对女儿吃药是担心副作用。两位农村老人淳朴地认为，如果明明回家，有人聊天，想干嘛就干嘛，那么比吃药更有用。何

况，明明“看起来”已经完全正常了。但医生和老应则无法接受这个观点。恰恰由于父母是天然的监护人，这种质朴的“保护”有时可能会成为无心的伤害。——这就是两个家庭的根本分歧。事实上也造成了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困境。

明明是个文静、内向的姑娘。她下了点水饺，还问记者要不要吃点。而记者和老应聊天时，她就在旁边安静地听着，时不时拂去干爸肩头的几颗尘粒。

无聊了，明明就坐上琴凳，弹一段钢琴。当琴声随着女孩的手指，瞬间填满整个客厅时，似乎有种力量让人忘记这故事中辛酸的部分，而只呈现出它闪亮的章节。

弹琴，是这个农村辍学女孩到上海“新家”后，老应亲手教的：“巴赫的《赋格的艺术》难度非常大，很多人花 10 年都不一定能弹好，但明明只学了一年，就相当出色了。”

国际音标引发的“闲事”

从认识这个女孩开始，老应就不断被她的聪颖和天赋惊到。至今他依然认为，明明是“万里挑一的天才”。

2005 年，老应在徐家汇自家小区门口吃饭时，一个看似只有十四五岁的女孩怯生生地过来和他打招呼。女孩是餐厅负责开门的。

女孩问：“你是外国人吧，那这个单词该怎么念？”

老应给出答案，但吃惊地发现，女孩竟用国际音标把发音准确无误地记了下来。老应自己虽是奥斯陆大学语言专业毕业，但国际音标是进大学后才学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有两个名字，你是问真名，还是身份证上的名字？”

“为什么要用假名字？”

“是为了办工作许可证，因为我年龄不够。”

老应后来知道，刚到上海打工时，明明还不到 16 岁，初三念了一半。

徐汇区某居委的一份内刊为老应的个性画了“素描”：“挪威外籍人士老应先生，甘当义务交通宣传员，看到有人闯红灯，他马上拉住宣传教育……”这么个爱管“闲事”、执着于“正确”的老外，当然容不得眼前这个聪明的女孩作为“童工”来上班。餐厅的场地是小区提供的，那送女孩回学校，老应认为就该由小区管起来。

架不住老外的执着，物业和居委答应给他开个会，但唯一成果是分析总结认为，“这个问题有三个子问题”——女孩不工作，生活费怎么办？谁来负责她的教育？她在哪儿生活？

老应说，他可以出学费，让女孩进附近的学校。

不仅是学费，事实上所有问题最终还是靠老应推动。而打听下来，没户口，女孩根本没法进上海的初中念书。一连串碰壁后，老应想到了教育局。

在招生办，他告诉接待他的王志方主任，如果今天不解决，他就不走了。僵持了 15 分钟，王志方让步了。老应说，王主任直接提起电话，拨了个号码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那头说：“下星期，有个新生到你这里报到，她叫明明，有个外国人会陪她来。”

于是，明明就成了徐汇区南海模

范进修学校的一个编外学生。

自那以后，王志方成为老应的朋友，为明明的教育、看病帮了很多忙。当然，这是后话。

学费、学校解决了，只剩一个“子问题”。本来，餐厅给打工妹们安排了宿舍；可现在，明明住哪儿呢？

老应说，当他再次找到物业和居委时，每个人都不说话，看着他。“那就好像吃完饭要埋单，却发现只有我带着钱包。”老应说。

小家伙,大家伙,老家伙

老应和中国的邂逅，始于 1986 年。那时他大学刚毕业，由于学过中文，于是到中国参加一次国际交流，谁知刚落地就突发病毒性心肌炎。在上海海员医院的外轮病区，他一住就是大半年。

住院期间，他爱上了负责他医保事务的中方代表。出院后，两人举行了婚礼，并回挪威定居。

从 1990 年代初开始，老应（那时还是“小应”）感觉身体特别容易疲惫。一检查才发现，几年前的心肌炎影响了他的线粒体功能。此后，老应的身体每况愈下。1994 年，他已没法步行到大学上班，不得不在 33 岁那年退休。到 2001 年，甚至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挪威的医生对此无能为力，认为他除了卧床休息，没有其他办法。此时，一位中医朋友帮了忙——张大夫一次针灸，就让老应站了起来。扎了一个月，他竟然能出门买面包了。但张大夫说，每年夏天，他都要回国一两个月。

老应慌了：“我怎么办？”

张大夫建议他，去中国吧。

2002 年 5 月，他飞到上海，随后在徐家汇买了房，因为这里距离擅长中医的龙华医院只隔一条街，这让他有机会遇到在小区门口打工的明明。

来中国 10 年，老应没回过挪威。他的老母亲 2004 年也搬到上海，由他照料，而母亲后来多次中风，无法承受万里奔波。

如果要把一个中国小女孩领回家，老应担心，母亲会不会反对？他小心地给母亲先撒了个谎，说明明是新请的保姆。

事实证明，老应多虑了。祖孙俩相处得非常好；“我妈给明明起了一个挪威语的爱称‘小家伙’。相应地，明明就叫我妈‘老家伙’，叫我‘大家伙’。”2010 年，老太太在上海过世，明明比谁都伤心。

在客厅，老应为明明摆了一张席梦思。明明的大哥说，一开始，他们家也有些担心，但看应先生人很好，也就放心了。这张席梦思，明明的哥哥、姐姐、父亲都睡过。明明发病前，两家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。

老应说，明明全家都很淳朴。她父亲来上海要坐很久的火车，老应曾提出由他出钱买个卧铺，但被拒绝了。明明也一样，她不要老应给她买手机，不要电脑。给她 500 块零用钱，她只会要 100 块。

就这样，两个原本平行的家庭相交到了一起。

“小姑娘,灵光的”

要还原明明在上海最初的读书轨迹并不容易。最了解她的初中班主任身在海外，始终联系不上。好在教务处的卫国老师还记得这个陕西小姑娘。

卫老师说，所有孩子的成绩单都在她手里，所以她记得，小姑娘刚来时，

成绩一塌糊涂。班主任也曾告诉老外：应先生你很努力，但这个孩子该去上班。

当所有人都认为明明跟不上的时候，卫国记得，老外依然“盯得很紧”，给老师提了很多要求。到年底，小姑娘的成绩过得去了。转眼到第二学期，竟一下子蹿到年级前几名。

卫老师后来常听明明的班主任感叹，这个小姑娘灵光的，也可惜了。如果户口在上海，一定能考上不错的高中。

“可惜”终于成了现实。2006 年，其他学生都毕业，可明明作为外地生，甚至连毕业证也拿不到，更别说参加中考，进入高中。

老应不忍心让这有天赋的女孩子就此中断学业。这一年里，明明天天和老太太练英语，口语突飞猛进，还学会了钢琴。

那回陕西呢？当地教育局答复老应说，没在陕西念完初三，不能中考。

老应对着通讯录，给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的学校、招生办打电话，未果。最后，他甚至还打到了港台，打到欧洲，可对方都表示，中学生不会得到入境许可。

记者问老应：“你这么做，是出于责任，还是感情？”

老应答：“有些人提到责任，更多地想到的是对单位或者集体的责任，比如哪怕生病也要坚持上班。但对我来说，只要把一个人领进家门，就必须保护好她。”

山穷水尽之际，老应得知，日本或许会给中学生签证。于是，他拨通了横滨国际学校（YIS）的电话。三十多年前，1970 年代，他随外交父亲在日本生活时，曾就读于这所学校。接线员很热心，把电话转到现任校长那儿。当老应告诉校长，自己是校友，遇到了一个问题时，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温暖回答：“答案是 YES，那您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
听老应花了 10 分钟讲述明明的故事后，校长说：“你们先到横滨来吧。”

老应仍然需要再解决一个问题——他掏出手机，照着通讯录，一个一个打电话，东家借 300 元，西家借 500 元，就这样，凑了两张机票钱。

短暂的日本“留学生涯”

横滨国际学校是全球历史第二悠久的国际学校，仅次于日内瓦国际学校，招收在日本最优秀的国际学生。在漂亮的教室里，YIS 的校长接待了他们。既是交谈，也是面试。很自然，学校希望知道明明擅长什么？

坐上琴凳，明明开始弹巴赫。

老应说，在场的所有人显然被《赋格的艺术》打动了。只花了 5 分钟，校长对财务经理说：“我们现在去吃饭，一个小时之后回来，你想想办法，用最简便的流程，免去明明所有的学费。”YIS 的高中学费是每年 20 万元人民币。

在老应家里，记者看到了 YIS 颁给明明的校友年鉴。一张张身着漂亮学生制服的半身照片，洋溢着各种肤色的微笑，明明就在其中。如果不加指点，根本无法想象，仅仅一年前，这个姑娘还在餐厅拉门。

老应说，从 YIS 毕业的学生很有可能被耶鲁、哈佛等名校录取。彼时彼刻，老应觉得，明明的未来终于有着落了，他也可以松口气了。在日本待了不久，他回到上海；明明则按照学校安排，住进了老师家。但事情没这么简单。

几个星期之后，学校在电话里告诉老应，明明不合群、不爱说话。而且，老应发现，与明明同住的老师，似乎很不友好。

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，总之，明明没能适应 YIS 的环境。那年 12 月底，老应在浦东机场接回了明明。

一到家，明明就在沙发上又蹦又跳，还给很多老朋友打电话，兴奋地说：“我回来啦！我回来啦！”很明显，无法继续留学生涯，明明不仅没有任何遗憾，而且开心得不得了。

老应理解明明：“一般人看重的那些——钱、文凭、工作，在明明的价值观里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她看重的是人和人的感情。”但他也清楚，明明回国，意味着他必须在中国继续照料她，而且将持续很长时间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真正感觉明明是自己家庭的一员。

明明的大哥说，2007 年，自己离开上海，等于把妹妹完全托付给了应先生，但他很放心。在这个家，明明的意见一直受到尊重。大哥说，应先生交的女朋友，如果明明觉得不好，他就会放弃，直到明明喜欢为止（因为妻子不愿离开挪威，老应此时已恢复单身）。

老应告诉记者，“留学回国”后，明明在上海进学校变容易了，至少可以在职校和私立学校读书。

不出意外，入校后，明明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2009 年，明明通过成人高考，被上海某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本科班录取。在该校盖着公章的文件上，记者看到的评价是“学习努力，成绩优秀”。

可惜的是，这是一张因病退学证明。

诊断结果：精神分裂症

老应和前妻没有孩子。2010 年初，老应的母亲去世。从此，明明几乎成为老应在世上唯一的牵挂。而且，老太太的去世使得这个家庭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，损失了超过一半的收入。但老应告诉明明：“专心念书，其他的别去想。”

年底的一天，明明忽然对老应说：“你打电话给诺贝尔奖评委会，让他们把明年的奖发给我。”

老应哈哈大笑：“你终于学会了挪威人的幽默。”

可几秒钟之后，他发现，因为这句话，明明脸都给气白了。老应意识到，明明不是在开玩笑。

他打电话给挪威的医生朋友。对方说，电话里很难判断，但请一定带明明去看医生。

老应赶紧把明明的父亲叫到上海。进了门，明明爸却没发现女儿有啥异样。怀揣着各种复杂心情，三个人一起去吃饭。席间，明明腾地站起来，退了好几步，一脸惊恐，指着身边大声叫嚷起来，还扔了椅子。而她面前，只有空气。

当即，两个爸爸带女儿去医院。诊断很肯定，精神分裂症。医生认为，可以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，也可以先吃一段时间的药。电休克治疗是在麻醉下进行的，相当于一次手术，手术就有风险。在听了医生一连串的风险告知之后，明明爸有些晕了，替明明选择先吃药。

药物没有效果。随后两周，情况急转直下，最后明明甚至认不出熟悉的人，也不能走路，甚至失语。

老应回忆说，醒着的时候，明明的脉搏经常在 150 跳以上——她被莫须有

的恐惧完全包围了。

明明爸同意了电疗。他把所有与治疗有关的事情，包括所有家属签字的程序，都委托给了老应。

明明正式住院，是 2011 年的除夕。这前前后后一个多月，老应一直失眠，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。

好在电疗起了效。做了 2 次，明明就能颤巍巍地站起来。第 5 次后，明明忽然对探望她的老应说：“你是不是有个弟弟？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”记忆，正从明明的大脑中慢慢恢复。这句话大概是老应那几个月里得到的最好消息。

明明的主治医生陈海莹告诉记者，住院的 2 个多月里，她天天见到应先生，他慈父般的关注让她深受感动。出院后，每次随访或是拿药，应先生总是会提前电话预约，到医院也非常守时。

老应不愿给明明用便宜的国产药，因此，明明出院后，每月药费开销超过 6000 元。明明刚进这个新家的第二天，老应就给她买了商业保险。在生病后，保险公司在支付到 2 万元封顶医疗费后，永久性地终止了合同。

除去按揭，这父女两人每月只剩下 2000 多元的生活费。每个月退休金发放前的一个星期，老应会把每天每一笔支出，做一个非常仔细的规划。有时整个星期，老应每天就只吃一顿饭。但老应说，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，他还能支撑，不至于这么着急卖房。

回上海？“再说吧”

出院后的明明，一天天好起来。到 2011 年底，明明爸把女儿接回老家过年。临行前，老应让明明带了 2 个月的药。坚持吃药，是老应最关心的。

过完年，明明爸却没有让女儿回上海的意思。每次，老应打电话让明明回上海康复，明明虽然愿意，但明明爸总是说“再说吧”。

算着之前带去的药快吃完了，老应急了。他叫上朋友，坐火车去渭南送药：“精神类药物没法邮寄，而且这么贵的药，能寄我也不放心。”

来中国这么多年，老应实际上除了长三角，哪儿都没去过。针灸虽然让他能生活自理，但身体依然不好。为了明明，老应还是开始了他第一次在中国的长途旅行——充满烟味的火车、颠簸的汽车，最后还搭乘了一辆装满土豆的货车，老应好不容易赶到渭南小村明明的家。

这里不通自来水，除了电灯和电视，最现代化的电器也许就是一条睡觉时用来取暖的电热毯。

旅途消耗了他很大的精力。买票、等车时的排队，对他来说都是煎熬。他的疾病让他不能长期站立，否则心脏无法维系血压，人很容易晕倒。而且，他对许多药物过敏，不能用抗生素，感冒都得靠针灸。他对许多食物过敏，食谱很有限。

疾病，让老应的身体非常敏感。小村的条件，让他受不了。他不能洗澡，也无法入睡，甚至没法排便。就这样，老应坚持去陕西送了两次药。然而，当他再次打电话给明明爸时，对女儿返沪的时间，得到的答案依然是“再说吧”。

老应说，放下电话，他忽然意识到，也许，明明再也不会回上海了。明明离不开他送的药，但他的身体没办法再承受这样的旅程折腾。他感到了一阵绝望，就像坐在一条失去动力的船上，快速漂向一道瀑布，即将跌进深渊。

他必须把房子换成现金，而且越快越好——首先是不能再坐公共交通工具，所以，他要买一辆能跑长途的车；同时他要为将来做一些准备。

拿到卖房的钱后，还绰贷款，老应租了一套 2000 元的公寓，却买了一辆奔驰。这种配置太独特了。但老应说，买奔驰是因为他必须要足够可靠、又适应他的身体状况的好车。这一千多公里的旅程，绝对不能抛锚；而且，到了陕西，他打算就睡在车上，所以要足够舒服。剩下的钱，老应也有安排。

最后通牒起效了

老应叫上中介宋铖，请他陪自己去了趟陕西。他想在当地买套房子，留给明明。

（下转第十一版）